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〇期 ——  
(二〇〇三年三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303a)

【当事者说】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徐景贤
【亡灵祭坛】林昭同案犯张春元、杜映华之死	丁抒
【史海钩沉】“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兴亡记	李晓航
【国际风云】前苏联军官眼中的中苏珍宝岛冲突	佚名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当事者说】

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秘辛

• 徐景贤 •

一九六九年，我自始至终积极参加了张春桥“九大”整陈毅的全过程。

### ◇ 批判“二月逆流”

这件事首先得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说起。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全会。会议对参加1967年“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当时谭震林已经被打倒，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资格。其他到会的陈毅等六人被分隔编入各个小组，听取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批判。主要批了他们三个“反对”：“反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揭发的结果说：这几个人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分成两个摊子互相串联，反对文革，其中的“联络员”就是陈毅，他来往于两摊之间传话。按照中共党内斗争的惯例，一个人在倒霉的时候，他在历史上的老账就会被翻出来加以清算。这样，陈毅早已作过检查的关于在井冈山时期不支持毛泽东、犯了路线错误的事，就被作为今天犯新的错误的历史根源，联系起来，刨根问底，进行严厉批判。全会并把批判发言印成简报分发。

十月二十六日林彪在全会上作了一次讲话，他说：“二月逆流”是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

林彪的讲话给所谓的“二月逆流”定了性。

全会在讨论召开“九大”的准备工作时，对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还要不要选举他们当“九大”代表，有不同意见。陈毅则表示自己当代表不够资格。

在10月31日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出来讲话了：“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毛泽东吩咐：对一些细枝末节，不要去追究了。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

事情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张春桥回到上海，马上宣布成立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张、姚和王洪文、徐景贤、王少庸等组成。接着，他在康平路小礼堂召开市革委会各组、办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这些人都是‘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要把他们的材料搜集起来，供‘九大’开会的时候使用。可以通知各口、各群众组织，把这些人在上海的活动情况，统统搜集起来，把知情人都发动起来……”

张春桥还当场决定，在康平路大院里成立一个专门的“九大”材料小组，由王洪文和我直接抓。

于是，由王洪文指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李某，由我指定市委党刊的朱某，分别担任这个“九大”材料小组的具体负责人。

材料小组开会商量，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收集材料：一是把这些被称作“黑干将”的老同志过去在各个场合、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集中起来，摘录其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二是把历届市委、市人委和各部、委、办等机关的档案，来一个翻箱倒柜，从中摘取有关材料；三是动员过去和这些老同志共过事的人，或是在他们领导下工作过的干部，起来“反戈一击”，写出书面的揭发材料，即使关在“牛棚”里的审查对象，也不要放过，动员他们“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 ◇ 张春桥：陈毅只会下棋

张春桥重点要迫害陈毅，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陈毅当过新四军代军长、三野司令员，上海干部中有许多是新四军和三野转下来的，对老首长陈毅十分爱戴；二是陈毅在一九四九年亲率三野解放上海，接着出任上海首任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为人光明磊落、坦诚豪爽，与上海人民忧乐与共，享有崇高的威信。现在张春桥要想在上海站住脚跟，取陈毅而代之，成为上海市的党政一把手，就必须千方百计削弱陈毅在上海群众中的影响。

有一天，张春桥看到康平路市革委会办公室编的一份情况简报，其中反映有些干部在得知陈毅挨整的消息后，背地里议论陈毅过去如何善于指挥战斗，而现今的上海市领导根本没有打

过仗等等；还有静安区的一个干部，在听说陈毅受到批斗以后，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张春桥看后，气得要命，决定马上召开市革委会扩大会议，由他自己亲自主持并作讲话。

这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参加者有市革委会全体委员、各组办负责人、各区县局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以及各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约四百人。

张春桥在会上传达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直接点名批判参与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对陈毅批得尤其厉害，他说：“主要是七个人，形成两个中心，一个是以李富春的家为‘裴多菲俱乐部’的中心，有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参加，多次开黑会；另一个是以京西宾馆和西山为黑据点的中心，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三个副总理，三个军委副主席，一文一武。在这两个中心之间穿针引线的就是副总理兼军委副主席陈毅，他实际上是‘二月逆流’的总联络员，两面跑，一下到国务院，一下到军委，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两个中心，是一股势力，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中心。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接着，张春桥把重点转到陈毅身上：“陈毅，过去是新四军的，解放以后又在上海工作了一个时期，所以有些人至今对他还有迷信。静安区有一个人，听说陈毅受了批判，居然还替他掉眼泪！因此，我们要揭穿陈毅的老底：他这个人，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反对毛主席。有人把他在军事上吹得神乎其神，其实他不会打仗，只会下棋……”

讲话完毕，张春桥规定必须把全会精神“原原本本”地传达到上海的基层群众，企图用高压政策来抑制上海人民对陈毅的怀念和爱戴。

#### ◇ 选陈毅为右的代表

过了几天，张春桥和姚文元到北京参加“九大”筹备工作去了，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的节奏，也加快起来。不久，张春桥通知王洪文、我和王少庸：“中央决定上海的‘九大’代表名额为八十名；另外，张春桥、姚文元两人以及陈毅，都由上海选出，但不占上海的代表名额。至于陈毅，应当由上海的‘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出面，将代表履历表寄给他自己填写，同时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上海打算选他为‘右的代表’，看看他的态度如何。”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我就起草了一封致陈毅的信：

陈毅同志：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信发出后不到一星期，陈毅就把履历表填好寄回，并附短信，无奈地对上海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选他作为右的代表参加“九大”，表示感愧。

我赶紧把陈毅的回信寄给张春桥阅，张看了以后催促我们要加紧材料准备，因为在“九大”会议上，肯定有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王洪文和我都着急起来，要求“九大”材料小组在最短时期内拿出材料来。

“九大”材料小组的成员为了把陈毅的材料搞到手，翻遍了各种档案资料，还挖空心思寻

找陈毅的社会关系。有一个干部过去当过陈毅的警卫员，“九大”材料小组就通过组织对这个警卫员施加压力，让他写出揭发老首长的材料。上海市文史馆反映了一个情况，说陈毅当市长时批示过要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当文史馆馆员。“九大”材料小组马上跟踪追击，发现有一个国民党的旧人员，戴过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对金石篆刻颇有造诣。他把陈毅写的诗词搜集起来，刻成一本印谱，送给陈毅。陈毅爱才惜才，就写了一张条子给上海市文史馆，安排他为文史馆馆员，按月发给津贴，一方面展其所长，一方面解决其生活困难。这可是一份尖端材料！“陈毅包庇反革命分子”，马上成为材料小组搜集到的重要内容之一。

#### ◇ 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一本三十来页的《陈毅同志言论小集》的清样赶排出来了。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1953年至1966年期间，在上海、北京等地各种会议上的报告、讲话及接待外宾时的谈话纪录中摘抄编成的，共分九个部份，都是上纲上线的，标题如下：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  
“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  
“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小册子编成后，送王洪文、我和王少庸等审定，我觉得上纲上得不够，便把小册子的标题改为《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最后送张春桥、姚文元过目后，一共印了八十多本，准备分发给上海的“九大”代表。

一九六九年一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区、县、局的党员代表会议。会上王洪文宣读了“九大”代表的预选名单，还专门宣读了陈毅的来信，大家举手通过，上海参加“九大”的代表就算正式选出来了。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八十名上海“九大”代表集中到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举办“九大”代表学习班。学习王洪文介绍“安亭事件”和“打‘上柴联司’”的经过，由我介绍“一月夺权”的基本经验，由马天水介绍上海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基本情况，由王少庸介绍专案工作情况，等等，使代表心中有数。学习班结束之前，又把铅印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上海的“九大”代表，人手一册，要他们预作准备，以便到“九大”会议上去和陈毅“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除了搜集陈毅的材料以外，张春桥还指名要搜集“‘二月逆流’黑干将”叶剑英等人的材料。“九大”材料小组当然也不遗余力地搜集到了。有些材料已经印成了清样，还有些关于陈毅、叶剑英等的内部绝密材料，是手写的仅供领导参考。这批材料，共计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

1969年3月初，中央通知王洪文和我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参加“九大”预备会议。临上飞机之前，王洪文的秘书小廖提来一个大皮箱，交给我们拎到北京去。皮箱里面满满地装着上海搜集到的全部材料，王洪文还把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简报全部带上，因为那里面刊载着揭发陈毅从井冈山时期起反对毛泽东的多篇发言稿。这些都是我们准备在“九大”会议上向陈毅等

人猛烈开火的“重磅炮弹”。

“九大”开会期间，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率领的上海代表团住在京西宾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住在钓鱼台。

大会开幕前，张春桥、姚文元到京西宾馆看望上海代表团。张春桥对王洪文、我和王秀珍说：“陈毅是上海选的代表，他应当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嘛！你们可以通过大会秘书处通知他，什么时候开会，就让他来参加，听听大家的意见。”

姚文元接过张春桥的话头：“我同意春桥同志的意见，按照陈毅那本言论集的几个部份，要上海的代表们分头准备一下，从不同的角度发言，进行批判。”

“我们想把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一册给陈毅本人，让他自己看看。”王洪文出了一个点子。

“可以。”张春桥回答，“应该是肃清陈毅在上海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切部署就绪，就等陈毅出场。

◇ 王洪文：请陈毅清算自己

1969年3月27日晚，上海的八十名“九大”代表齐集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张春桥和姚文元故意不到场。王洪文、我以及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坐在主席台前，旁边给陈毅留了一个空位子。

王秀珍喉咙响、声音尖，事先商量好由她守候在会场门口，一看到陈毅进场，就带领大家喊口号。当时，“九大”秘书处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负责，他听说上海小组要批陈毅，特地派了两名联络员来，坐在后排，一面做记录，一面观察动向。

会场里的空气一时显得有些紧张。开会时间到了，代表们都转过脸去，朝会议室的入口处张望，等待陈毅进场。

忽然，听见王秀珍的尖嗓子高声喊将起来：

“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

“陈毅必须老实交代！”

“陈毅必须低头认罪！”

代表们也跟着齐声叫喊起来。

陈毅来了。

会议由我主持。我示意陈毅在主席台的边座上坐下，接着便来了一段开场白：“今天，我们‘九大’上海小组的八十一名代表，在这里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同志作为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今天也来参加会议。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上海市的共产党员，选举陈毅同志为右的代表。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工作期间，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又卷进了‘二月逆流’。对这些问题，我们上海的代表们必须进行清算。”

说到这里，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举在手里扬了扬说：“我们把陈毅同志过去在上海等地发表过的讲话，摘编了一本集子……今天，我们要把这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当面送给陈毅同志，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彻底清算自己！”

说罢，王洪文把小册子递给陈毅。陈毅一下子懵掉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今天会收到这样一份见面礼。他欠起身子，双手接过小册子，讷讷地说：“应该清算……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承蒙上海党选我当‘九大’代表，我很惭愧，我一定要……”

“什么上海党、北京党的，我们的党只有一个。你陈毅这种说法是制造分裂！”主席台下面飞出一条大嗓子，打断了陈毅的话。

“是的……”陈毅更加惶恐不安，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主持会议的我见到一上来就让陈毅威风扫地，很是满意，就宣布批判发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就是王洪文，发言的题目是：“彻底揭发陈毅同志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咀脸”；接着，嘉定县农民代表周某的发言题目是“批判陈毅同志反对工农兵、大搞阶级投降的反动本质”；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唐某的发言题目是“看陈毅同志在‘二月逆流’中的拙劣表演”……代表们事先都作了准备，他们的批判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像连珠炮似地向陈毅射去，陈毅忙不迭的在桌子上做着记录，批判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才暂告结束。

午夜，代表们聚集到京西宾馆底层大餐厅去吃夜宵，王洪文、我和王秀珍都兴高采烈，以为身名显赫的陈毅元帅，如今被我们批得晕头转向。初战告捷，使我们的情绪处在兴奋的状态之中，我们商定要趁热打铁，继续再批。

#### ◇ 张春桥：让陈毅讲话

第二天上午，向来起床很晚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反常态，早早就从钓鱼台联袂赶到京西宾馆来了。在上海代表团住的七楼小会议室里，他们津津有味地听取了汇报。其实，他们早已从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那里，了解到批判陈毅的情况，但意犹未尽，仍然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几个争说昨天晚上的具体情景，特别是听说到陈毅收到小册子时，猝不及防、颇为狼狈的时候，一向严肃正经的张春桥放声大笑。笑了片刻，当王洪文提出还要再批陈毅的时候，张春桥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能光批人家呀，也得让陈毅讲讲话嘛！”

一言为定，3月29日晚上继续开会，而且事先通知陈毅让他发言。在代表们批完以后，听听陈毅说些什么。如果他的态度不好，再批。

第二次会议开得时间更长。这次会议由王洪文主持，先是由代表们又作了连篇累牍的批判发言，随后让陈毅表态。今天，陈毅看来已经有所准备，而且比较不在乎会议的气氛了，神态和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受到突然袭击那样局促和不自在。

陈毅一边翻着上海编的那本小册子，一边侃侃而谈。他谈到自己曾经有较长时间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有着深厚的感情，虽然一九五四年起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但是仍然兼任上海市市长，一直到一九五八年，共当了九年的市长。在上海工作久了，讲话的机会又多，确实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欢迎代表们批判。陈毅又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承认开始的时候确实不理解，犯了严重错误，但还是愿意改正的。接着，他谈起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他说，自从上了井冈山以后，四十多年来，自己一直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然有的时候思想一时跟不上形势，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理解不深，但是自己基本上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

陈毅一口气讲了三刻钟。下面的代表们听得不耐烦了，有人中途就喊叫起来，打断了他的讲话：“陈毅不要评功摆好！”“陈毅老实交待实质问题！”

陈毅没有理会中间插进来的干扰，还是继续他的讲话。多数代表并不了解党史、军史，也提不出有力的论据来批驳。

王洪文见状，就跟我咬耳朵，要我把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些老红军揭发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抛出来，将陈毅的气焰压下去。王洪文从文件袋里取出他事先准备好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交给了我，让我发言。

#### ◇ 翻陈毅旧账

陈毅刚讲完话，我就抓过话筒，对陈毅的发言进行“消毒”。我说：“刚才陈毅同志给我们上海小组的全体代表上了很好的一课。他的发言又长又臭，说明他直到现在还在坚持‘二月逆流’的反动立场。我们上海给你编了言论集，代表们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批判帮助你，可是你却采取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舍近就远的方法，大谈自己的光荣革命历史，把自己打扮成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你这是妄图欺骗一些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然后自己蒙混过关，这种手法，必须予以揭穿。”

说到这里，我把那本装订成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啪”放在桌上，当众打开，把其中的内容揭了出来：“难道你陈毅真的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吗？否！根据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揭发，在井冈山时期，毛主席是红四军前委书记，你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举行的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你却反对毛主席总结和创造的关于建党建军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原则，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迫使大会否决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

我所念的简报内容，很多代表都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吃惊地瞪大着眼睛，会场里鸦雀无声。

“也是在这次红四军‘七大’，你陈毅这个政治部主任把毛主席赶下台，取而代之，自己当选为前委书记。这还不算，以你为首的前委还决定要毛主席离开部队，到闽西去搞地方工作。你的这些错误，在后来召开的红四军‘九大’上终于被揭发出来。大会所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毛主席所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就是对你的问题作了严肃的批判吗？”

会场里出现了轻微的骚动，代表们这才晓得为自己所熟读的《古田会议决议》，原来有这样的历史背景。我清了清嗓子，继续向陈毅猛攻：“就是你这个在四十年前就反对毛主席的陈毅，到了四十年后的今天，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你刚才的发言中胡说自己是一贯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这是对代表们发言的猖狂反扑，也说明你根本不肯承认自己是右的代表。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刘备手下有一个大将叫魏延，他的后脑长着一根反骨，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蜀国。四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你陈毅就是后脑长着反骨的当代魏延！”

我带有煽动性的发言，把代表们激怒了，王秀珍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陈毅！”很多人都举起手跟着呐喊起来。这时，大会秘书处派来的联络员急匆匆地走了，估计是去向领导汇报会场上情况的。

陈毅默默地坐在座位上，低俯着额头。显然，刚才我的发言使他大感意外，而且使他深深地激怒了。他的脸庞涨得通红，颈后有几根青筋微微突起，他的嘴唇轻轻地翕动着，想要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

关于这一段党史、军史，陈毅是最熟悉不过的了。当年，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确实和毛泽东发生过争论。可是，后来在毛泽东离开部队以后，红四军失去了领导中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有增无已。陈毅为此深感忧虑，趁着到上海去参加军事会议的机会，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要陈毅代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工作，肯定了毛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和陈毅面谈时，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要陈毅马上返回，把离开部队的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红四军前委的工作。陈毅回到苏区，都照办了。

关于这一段历史，中央早已作过结论。陈毅自己也作过多次检查。可是，陈毅没有想到，在1968年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偏偏有人把这段历史重新翻了出来，加以清算。今天，到了‘九大’会议上，又把这些历史上的陈年旧帐，作为他陈毅反对毛泽东的新鲜话题，抖落在不了解党史、军史的青年面前。在毛泽东的威望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的今天，听到这些材料，如何能不激起人们的愤怒呢？陈毅想作说明，可是“夫复何言”！

陈毅在座位上紧紧地作蹙起了眉头，通红的脸颊上，两块下垂的肉微微地颤动着，嘴里呼哧呼哧吐着气。他欲言又止……欲言又止……

王洪文瞅瞅陈毅，认为他的气焰已经完全被压倒了，就趁势收篷，宣布说：“我们奉劝陈毅同志认真考虑代表们的批判、帮助，作出一个像样的检查来，下一次向代表们彻底交待……好，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陈毅缓缓地站起身来，捡起桌子上的那本言论集，颤巍巍地走了。代表们也都散去了。

#### ◇ 周恩来透过吴法宪传话

王洪文、我和王秀珍等留下来，正在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打算的时候，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通知我们几个马上到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吴法宪的办公室去一次。

在吴法宪办公室等了十分钟左右，吴法宪进来了。他客气地和我们逐一握手，然后座在办公桌前，字斟句酌地说：“上海的‘九大’代表们开了两次会，帮助陈毅同志，我们的联络员都在场，已经向领导上作了汇报。上海的代表们对‘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表示义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总理把我找去了，总理指示适可而止。所以，找你们几位传达一下，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

我们频频点头：周总理的指示不能不听，会议看来不能再开了。

吴法宪又说：“这次‘九大’，要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毛主席指示：要保证这些卷进‘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选上。”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张春桥和我们没能再整陈毅。在毛泽东的安排下，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在1969年4月的“九大”全体会议上，仍旧当选为中央委员。

□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2001年12月号



~~~~~  
【亡灵祭坛】

林昭同案犯张春元、杜映华之死

• 丁 抒 •

北大才女、“右派分子”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上海当局处决一事已广为人知。而林昭遇难前后在甘肃遇难的两个她的同案犯张春元、杜映华，则是外界不知详的。

这还得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说起。

一九五八年反右结束，兰州大学将部份右派送农村劳动改造。其中三十六名右派学生、两名研究生和化学系讲师胡晓愚，共三十九人，分别到了武山、天水两县的农村。

武山县自然条件很好，天水至兰州的铁路和渭河从东至西横穿县境。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可是到了农村，学生们才知道农民是多么贫穷。他们看到十三四岁的女娃没有衣服穿，光着屁股在村里走动。特别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导致了更大的灾难。开始是“撑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起粮食忽然紧张起来。公社食堂每人每天的粮食从六两、五两、四两到二两。人们开始饿死。到了五九年底，粮食就没有了，食堂仅有大白菜给农民充饥。到六〇年二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以物理系右派学生何之明劳动的渭河北岸百泉公社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为例，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

这是兰州大学右派学生们再次卷入政治漩涡的背景。学生们虽被打成右派，成为贱民，却仍然关心政治，时常议论国是。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发起了办刊物的意见。两名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徐诚是南方人，与在上海的林昭相识，且志同道合。经联络，他们决定合作编刊物，取名《星火》杂志。武山县的学生们合伙凑钱买了一部油印机，自己动手刻蜡版，印成了首期《星火》，篇幅为三十多页，其中发表了林昭的一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刊物印成后，仅在自己人中传阅、讨论。

这时，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开始。该期有篇文章专谈彭德怀问题，称赞彭德怀为民请命，抨击毛泽东倒行逆施。在《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农村正在大量饿死人，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后果。共产党已经腐朽，需要一次革命。鉴于中国没有别的政治力量，他们寄希望于共产党内部的同志，希望由他们组织“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起来革命。他们计划日后寄给各省市的共产党领导人，希望靠他们来修改中共的错误政策。

中文系女学生谭蝉雪是“兰大的林希翎”，右派学生的头领。她是广东开平人，一九六〇年春，她打算偷渡香港，争取外援。由于他们赞同“南共纲领”，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其预期的援方之一。四五月间，张春元 and 原任物理系团总支副书记的右派学生苗新久外出联络。苗新久归来了，张春元却一直没有消息。

原来谭蝉雪早已被捕，张春元也在七月间就已被捕。由于他们是右派，没有合法身份证，他们曾私刻兰州大学党委、天水地方政府的公章，伪造介绍信，出门时用的是假证件。当局逮捕谭蝉雪、张春元后，化了两三个月才弄清其真实身份，才知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其成员大多数在甘肃。

这时,《星火》第一期尚未寄出,第二期尚在编辑中,突然,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在武山、天水的这批学生全部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数十名对中共当局不满、了解支持他们的当地农民。

苗新久等因参与创办漳县化肥厂,曾与中共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原漳县县委第一书记,五八年漳县、甘谷、武山县三个县合并成武山县后任县委第三书记)有所接触,与杜交流过思想,对中共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

差不多同时,林昭在苏州被捕。

由于甘肃省的“非正常死亡”极其严重,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发现……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征收过头粮所造成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开会改组甘肃省委,撤了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的职,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据说钱瑛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一九六二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其中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各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徐诚均十年以上。当地四十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

该案其它各被判重刑者差不多都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

本来,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杜映华判刑五年,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后,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在有一定的外出自由。

一九六八年上海当局处决林昭的前后,甘肃当局诬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八十年代初,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一一获得平反,重回社会。唯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三位死者,“平反通知”对他们本人已没意义了。

□ 本文原名“林昭与《星火》杂志”,材料来源于案中人何之明与作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几次谈话。

~~~~~

【史海钩沉】

##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兴亡记

• 李晓航 •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在北京地区兴风作浪。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狂叫:“《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凶猛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

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 一、“五·一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张建旗是钢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造成了张建旗极端的性格。5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自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sup>(1)</sup>

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这时，江青趁火打劫，她试图利用社会上的反周逆流进一步攻击周恩来。5月18日，她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示”纯系伪造。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由于反周逆流不得人心，北京的许多群众组织纷纷迎头痛击“反周逆流”。

5月24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2)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毛泽东的批示和群众的抗议活动使中央文革利用反击“二月逆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活动大受挫折，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共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但没有对“五·一六”采取任何措施。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活动。

“钢院五·一六红卫兵团”成员四处活动，奔走于北京各大专院校、中学、国家机关，扩张势力。6月14日，“六·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号召开展“各种形式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斗争”，“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各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趋高潮，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遭到攻击。

7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他们在传单中说，“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说：“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3)

## 二、“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号召打垮“五·一六”

当“文革”进行到8月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转向批判极“左”思潮。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针对武汉发生的“七·二〇”事件，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点明：“这是斗争的大方向。”(4)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这一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5)《红旗》杂志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使解放军受到猛烈的冲击，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他们公然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徐向前、徐海东等军队高级干部被诬为“七·二〇事件”的“后台”。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号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8月7日，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

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6)在王力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接着，造反派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两件事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游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未获全胜的形势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势必要出大乱子。为了排除干扰，毛泽东不得不出面表态。他对《红旗》第12期社论的态度是：还我长城。(7)经过慎重考虑，他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指出：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8)8月30日，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随即被送进秦城监狱。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给了中央文革一个沉重打击。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大字报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指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王、关、戚的问题解决后，在毛泽东看来，“五·一六兵团”同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一样，自行其是，不听招呼，是一股异己力量。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妨碍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五·一六”有一套独特的“理论”：第一，它从极“左”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第二，制造“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声称要揪出“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第三，把矛头指向军队。认为“当前军内出现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提出要“抓军队，抓枪杆子”，“要穷追猛打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第四，“要夺中央的权”。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推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和体制”，“国家政府机关各部，就其机构和体制说，大部份属于修正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柱。”因此，他们要“彻底地”“无情地打碎”“国家机器”，“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这种“理论”，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让这种“理论”继续传播下去，必然严重干扰文革的大方向，必须坚决排除干扰，予以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9)

毛泽东发出打垮“五·一六”的号令后，中央文革立即行动。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打倒！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

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8月27日，谢富治在接见工代会委员时说：北京有个“五·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sup>(10)</sup>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sup>(11)</sup>康生提出，“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谢富治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五·一六”。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左’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sup>(12)</sup>9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9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王、关、戚同“五·一六”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唯一能对造反派组织发号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打倒周恩来等，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1967年2、3月间，戚本禹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sup>(13)</sup>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毛泽东后来在1970年5月11日接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五·一六”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乘此机会要夺取政权。”<sup>(14)</sup>

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政策，周恩来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

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倒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

(15) 1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等的讲话时，也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他说：你们对“五·一六”问题要注意，现在有些单位有一派拿“五·一六”问题做文章，到处抓黑手压对方，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大联合，而且造成了更加对立。你们对双方都要做解释，告诉他们不管“五·一六”怎么样，是个支流。还说，“五·一六”要靠对方自己去批评，自己去揭露，你们这一派要顾大局，抓大方向，不要拿这个支流去压人家，也不要扩大化，不要弄得什么地方都有“五·一六”，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要因为支流忘记了主流，不要因为“五·一六”这个问题忘记了大方向去压对方，不管对方怎么样，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去作自我批评。(16)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周恩来、李富春等的预料。

### 三、在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9月7日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时这篇文章时，就打击“‘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章说：“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像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五·一六”已被摧毁。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其锋芒所向，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五·一六”，而是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掀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关于这一点，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17)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江青说，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一切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称作“五·一六”分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当然不信，说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



六’我不信。”<sup>(18)</sup>，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大批无辜，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五·一六”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蒙冤，惨遭迫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也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着。身为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sup>(19)</sup>。翌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清查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要求继续清查。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接着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清查“五·一六红卫兵团”本身，清查工作远远超出了

这个组织的范围，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才宣告结束。

注释：

- (1)《周恩来传》（1949—1976），第962页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59页
- (3)武汉《江城激浪》1967年10月7日，第5、3版
- (4)《红旗》1967年第12期，第47页
- (5)《红旗》1967年第12期，第55页
- (6)武汉《王八七专辑》，1967年11月24日，第2版
- (7)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册，1968年8月，第516页
-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183页
- (9)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宣传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册，1968年8月，第516页
- (10)武汉《工总好》1967年9月17日第4版
- (11)武汉《工总好》1967年9月17日第4版
- (12)《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年2月第1版，第55—56页
- (13)武汉《通讯》1968年2月28日第1版
- (14)转引自《党史研究资料》2002年第1期，第31页
- (15)新湖大革命造反临委会宣传部编《首长讲话》1967年9月22日第11号
- (16)武汉《学习通讯》1967年12月5日第1版
- (17)《新湖大通讯》1967年10月13日第3版
- (18)高振普著：《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第97页
- (19)《周恩来年谱》（1949—1978）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402页

~~~~~  
**【国际风云】**

前苏联军官眼中的中苏珍宝岛冲突

今年是珍宝岛事件30周年。珍宝岛是乌苏里江里的一个小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岛上有一些灌木，有几条河流从中国一侧流入该岛，像手掌一样。当年围绕该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俄罗斯传媒透露了这一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 达曼斯基岛疑团

1969年3月，在远东乌苏里江的这次战斗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边境最大的战斗行动。对此，多年来在俄罗斯存在种种猜测，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当时苏联人并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占领该岛，并问道：“当中国人进入该岛时，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太多，边防军根本无法对付他们，不得不动用正规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30年前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后来苏联政府也有意让人们淡忘此事，也只是将这次冲突描述为“1969年3月的乌苏里江事件”。

90年代初，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到“达曼斯基岛”了，于是俄罗斯人又开始猜测，开始议论当年的“秘密坦克”、议论关于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说“该岛已不复存在，为了让谁也得不到它，我们已将它炸毁”。达曼斯基岛事件仍是一片疑团。曾当过伊曼边防总队队长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诺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详尽的描述。

#### ◇ 摩擦由小到大

据康斯坦丁诺夫回忆：1968年秋，我们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发起挑衅行动。我、列昂诺夫和当时的边防总队参谋长巴甫洛夫一致认为，这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冰上以拳相向，而是实质性的冲突。我们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命令是：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不能让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官兵们传播这里发生的事情、争斗。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国内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正当党的领导人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漫长的中苏边界，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几年来两个大国的士兵经常发生打斗。1968年只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1968年11月的一天，边防总队指挥部曾向军区报告说：有可能发生武装挑衅，请求具体的书面指示，并加强力量。

一周后，边防总队司令和政委被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对他们说：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但只是口头意见，不能作为依据。

在相邻的基尔金岛上也一直有一些小摩擦。1969年1～2月在达曼斯基岛、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是用棍棒，而是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如果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一定会发生在这里。

达曼斯基岛和相邻边防队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哨所值勤人员都加强到了50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只要中国人一出现，我们的边防人员就向他们射击，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

我们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2月底的时候，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2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进入达曼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

从最近的观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80米，为什么边防侦察分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而中国人的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边防分队早晨沿达曼斯基岛巡逻时也没有发现可疑迹象，我们就从中国人的鼻子底下过去，他们也没有惊动我们，也许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

#### ◇ 3月2日行动

康斯坦丁诺夫说：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事首长足智多谋、训练有素、十分狡猾，选择3月2日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宣传报导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一天非同寻常。

第一，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这使中国人可以悄悄地占领达曼斯基岛，雪可以掩盖他们行进的痕迹。

第二，3月2日是北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中国人估计可能会有人请边防总队指挥部的人去吃饭或联欢，造成和指挥所的联系“不畅”。的确如此，边防总队的领导去了维也坚斯卡亚村，很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参加联欢会，而是去参加演习。

30年来没有人提起过演习的事。

实际上，事发前3天，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两个师参加，军区指示由边防总队扮演“敌军”。难道2个师抽不出来2个连扮演“敌军”，而非要边防总队去扮演“敌军”吗？可能当时军区司令部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

第三，周日和周六，我们的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

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官可能正是根据上述因素，才选定在这一天开始行动的。另外，我们在演习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坦克团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宣布进行战术停顿。中午12点以后，康斯坦丁诺夫返回指挥所，演习指挥部里响起了“焦急”的电话铃声，远东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来说：在下米哈依洛夫卡哨所，正在进行战斗，有人员伤亡。列昂诺夫马上下令给巴甫洛夫，让参加演习的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马上撤下，向达曼斯基岛出发。

事情就是这样，当达曼斯基岛两个哨所发生流血冲突时，整个预备队，即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却在离该岛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 硝烟笼罩达曼斯基岛

根据康斯坦丁诺夫的回忆，1969年3月2日技术观察站报告，发现有两个小队、约30名中国人已经进入苏联边界。上午11时左右，边防哨所的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小组，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两辆汽车去迎击入侵者。

他们决定从两面包围该岛，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5名边防军人和克格勃特别处派来的侦察员H·布依涅维奇上尉从正面接近该岛。他们后面约300米是第二小组，由巴班斯基中士率领，共12人。第三小组由拉伯维奇中士率领，共13人，从侧翼接近该岛。突然，他们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阵亡，巴班斯基中士带领的人占领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并进行还击。相邻哨所的摩托化机动小组赶去支援，带队的是维塔利亚·布别宁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取得成功。

参加演习的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在苏哈诺夫斯基峡口直升机追上了他们，机动分队转乘直升机火速赶往达曼斯基岛，周围一片硝烟，灌木、土地、装备都处在火光中。观察达曼斯基岛，在一颗树旁发现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人降落了。同时，装甲运兵车也来了，是斯科拉达纽卡军士学校的人。我们占领了达曼斯基岛，开始派人去找伤员。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挥的巴班斯基中士爬过来告诉我们，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小组，全部阵亡。

列兵彼得罗夫是从边防总队政治处来的，在他的短大衣下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我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看到，当斯特列利尼科夫正带人接近时，一个中国军人举起手，明显是向埋伏在战壕里的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

这一天的战斗是残酷的，苏方共死31人，伤14人。边防军夺回了达曼斯基岛，并挖了战壕，一个加强班一直在那里执勤。

#### ◇ 上校阵亡，“秘密坦克”陷落

为防止中国人再次侵入该岛，由亚申中校率领的一个机动分队来到这里，他们共有45人，4辆装甲运兵车，车上有掷弹筒；岸上还集结了80人的预备队，并有装甲运兵车，3月12日夜，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来到冲突地区，他们有一个摩步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独立坦克营、一个“冰雹”BM-21火箭营。

不知为什么，3月14日在该岛执勤的分队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该岛。康斯坦丁诺夫至今保留着当时在岛上执勤的分队队长沙拉金的报告笔录，笔录是这样写的：“3月14日，边防执勤分队听到了对岸中国人的喊话声，后来我们就接到命令，撤了下来”。从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战斗开始前15小时下达的。我问过列昂诺夫是谁下的命令， he 说是“军区”。但我估计，命令并不是军区下达的。我们走了，中国人又占领了该岛。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怎么回事，但这很不正常。

3月14日快到半夜时，列昂诺夫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求重新夺回达曼斯基岛。大约1~2个小时后，亚申中校率领机动分队到了。战斗开始了，关于岛上的情况并不明了。从最高观察哨上报告说，中国人跑到岛南端去了，占领南端后准备打击亚申的侧翼。后来又有9辆坦克前来支援，列昂诺夫发现坦克后说：“我现在去岛上”，说着他就匆忙出发了，甚至没有来得及确定联络信号。边防军虽有无线电台，但他们都不知道频率，坦克去参加战斗了，我们和它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人接近了列昂诺夫的坦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辆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挥所，而是返回了哨所。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有人觉得，中国人的坦克开到了我们这边，情况非常严重。列昂诺夫在坦克里受了重伤。此事报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昂诺夫上校。结果，有几次试图冲向坦克都未能成功。

15日夜16日凌晨，师侦察连连长勃尔特科夫斯基率领侦察营救小分队前去营救，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我们想用地雷将坦克炸毁，但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用火箭炮，从乌苏里江岸上发射每枚重达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准。坦克被打歪了，瞄准手已经看不见它了。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 ◇ 为什么不讲实话？

康斯坦丁诺夫说，对3月2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的宣传是这样说的：“10时40分，哨所响起战斗警报，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进入战备，哨所负责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将情况报告给了相邻单位的布别宁和肖霍洛夫，并报告了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赶走中国人，首长决定……”

是谁在什么时间向什么人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不像上面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这明显是在捏造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向本国人民以及中国人表明，我们的边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实际上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却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时的报导中并没有提及有军士学校和装甲运兵车参加，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我们占有优势。之所以不提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很少的兵力赶走了中国人。

政府在报导3月中旬达曼斯基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说：边防军把毛泽东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边防军的冲锋受挫，遭受重大伤亡，中国人在人数、技术装备和武器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战斗开始前该岛在他们手上。宣传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规军和坦克的事，对列昂诺夫上校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

#### ◇ 和平的努力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在1964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入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

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现在俄中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不再拥有达曼斯基岛了。它已划归中国，因为它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如果在1964年时我们听从济里亚诺夫将军的建议，那就不会发生1969年3月的悲剧。

□ 转载自《万维天下论坛》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